

周邦彥詩初探

黃坤堯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前言

周邦彥(1056–1121)，字美成，號清真，錢塘(今浙江杭州)人。父周原(1025–1076)，行醫鄉里，慈祥易感，勇於赴人之急，晚習導引衛生之經。周原生一女三子，呂陶〈周居士墓誌銘〉云：「娶張、陳二氏。女適里人陶漑。男曰邦直、鎮、邦彥。鎮早卒。邦彥有軼才，在太學久，獻賦闕下，天子嘉之，命以太學正。諸生莫不榮願焉。」¹元豐八年(1085)二月，周原葬於錢塘縣黃山之原，呂陶撰〈周居士墓誌銘〉，記述周氏家世，文中也提到周邦彥獻賦之事。案元豐二年(1079)，周邦彥服除入都，上距熙寧變法已逾十年。元豐六年(1083)在太學為外舍生。元豐七年(1084)三月，周邦彥二十九歲，獻〈汴都賦〉，頌揚新政，文采可取，神宗(趙頊，1048–1085)命尚書右丞李清臣(1032–1102)讀於邇英殿。詔以太學外舍生周邦彥為試太學正寄理縣主簿，即暫領縣主簿尉俸祿而在太學供職，主管訓導。²奇文

¹ 宋呂陶(1028–1104)：《淨德集》，《叢書集成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卷二六，頁285–86；《全宋文》(成都：巴蜀書社，1994年)，冊三七，卷1614，頁487–88；又參劉永翔(1948–)：〈周邦彥家世發覆〉，《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96年第3期，頁10–14。

² 參薛瑞生(1937–)、孫虹：〈清真事蹟新證〉，《新宋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第一輯(2001年10月)；收入孫虹(校注)、薛瑞生(訂補)：《清真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宋李燾(1115–1184)《續資治通鑑長編》(臺北：世界書局，1964年)云，元豐七年三月辛酉，「詔太學外舍生周邦彥為試太學正，寄理縣主簿尉。邦彥獻〈汴都賦〉，上以太學生獻賦、頌者以百數，獨邦彥文彩可取，故擢之。邦彥，錢塘人」(卷三四四，頁一一)。《宋史·職官志五》云：「〔太學〕正、錄，掌舉行學規，凡諸生之戾規距者，待以五等之罰，考校訓導如博士之職。」見《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一六五，頁3911。

壯采，一鳴驚人，周邦彥由是踏上仕途，更以一賦而得神宗、哲宗（趙煦，1077–1100）、徽宗（趙佶，1082–1135）三朝之眷，享有盛名。³

周邦彥兼擅音樂和文學，製曲填詞，音調流美，文才富贍，沈鬱渾成。清真詞流行於歌壇之中，到南宋末年猶傳唱不輟。⁴其詞以刻劃豔情愛情、離愁綺思、羈旅行役、詠物寄意為主；沒有頌聖貢諛、投贈唱酬之作，甚至不涉時事，不寫社會。可以說，周邦彥詞完全是「應歌」的作品，⁵他唱出了普天下歌迷的心聲，癡男怨女，悲歡離合，動人心弦。周詞摹寫世俗的情性，寫實言志的作品不多，內容十分平凡，然而他卻很用心地構築了詞中彩色繽紛、精美閎約的藝術世界。而「顧曲周郎」的美譽更不脛而走了。⁶

周邦彥以詞人名家，其人品在史書中評價不高。王稱《東都事略》云：「性落魄不羈，涉獵書史。……邦彥能文章，世特傳其詞調云。」⁷《宋史》云：「疏雋少檢，不為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之書。……邦彥好音樂，能自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傳於世。」⁸兩書論調一致，盛稱其博學及詞調，而於為人則有所訾議。

³ 宋樓鑰（1137–1213）〈清真先生文集序〉云：「錢唐周公少負庠校雋聲，未及三十，作為〈汴都賦〉凡七千言。富哉壯哉，極鋪張揚厲之工；期月而成，無十稔之勞；指陳事實，無夸詡之過。賦奏，天子嗟異之，命近臣讀於邇英閣，由諸生擢為學官，聲名一日震耀海內，而皇朝太平之盛觀備矣。未幾，神宗上賓，公亦低徊不自表襮。哲宗始實之文館，徽宗又列之郎曹，皆以受知先帝之故。以一賦而得三朝之眷，儒生之榮莫加焉。」見《攻媿集》，《四部叢刊》影武英殿聚珍版本（上海：商務印書館），卷五一，頁475。

⁴ 吳文英（1212？–1272？）〈惜黃花慢〉小序云：「次吳江小泊，夜飲僧窗惜別。邦人趙簿攜小妓侑尊，連歌數闋，皆清真詞。酒盡已四鼓，賦此詞餞尹梅津。」楊鐵夫（1866–1944）按云：「周邦彥號清真，有《片玉詞》，序其詞集者，即尹煥梅津也。」參楊鐵夫《箋釋》：《夢窗詞全集箋釋》（香港：龍門書店，1973年），頁226。案尹煥嘗云：「求詞於吾宋者，前有清真，後有夢窗，此非煥之言，四海之公言也。」引自宋黃昇：《花庵詞選》（香港：中華書局，1962年）之《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卷一〇，頁354。

⁵ 周濟（1781–1839）《介存齋論詞雜著》（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云：「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頁3）

⁶ 樓鑰〈清真先生文集序〉云：「樂府播傳，風流自命。又性好音律，如古之妙解。顧曲名堂，不能自己。」（頁475）又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亦云：「能自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名其居曰『顧曲堂』。」（卷一二，頁217）

⁷ 宋王稱（撰）、孫言誠、崔國光（點校）：《東都事略·文藝傳》，載《二十五別史》（濟南：齊魯書社，2000年），冊一四，卷一一六，頁1015。

⁸ 《宋史·文苑傳六·周邦彥》，卷四四四，頁13126。

這可能是受了黨派成見的影響，漸成輿論。此外周邦彥詞調流行，加上南宋小說家言附會李師師的故事，繪影繪聲，傳為美談，因此也就給人疏雋少檢、落魄不羈的感覺了。其實，如果細心閱讀周邦彥的詩文作品，刻劃一個「士人」的世界，完全不同於一般世俗所認知的「詞人」的身份，可能就會另有不同的看法。

周邦彥詩的藝術探索

周邦彥固以詞鳴，而其他的詩文作品亦多。宋代著錄的有《清真先生文集》二十四卷、《清真居士集》十一卷、《清真雜著》三卷、《操縵集》五卷等，今佚。陳郁嘗稱其詩數百篇，論云：「至於詩歌，自經史中流出，當時以詩名家如晁、張，皆自歎以為不及。」⁹可惜周邦彥的詩文集早已散佚，現在只有輯本。陳世隆《宋詩拾遺》只錄兩首，厲鶚《宋詩紀事》則有六首，¹⁰丁立中《武林往哲遺著後編》另加六首。羅忼烈《周邦彥詩文輯存》在前人的基礎上輯得古近體詩三十四首、各體文十二首。¹¹其後唐圭璋《周清真佚詩補輯》增輯八首。¹²羅忼烈《周邦彥清真集箋》編為周邦彥賦二篇、文十篇、詩四十二首。¹³後來羅忼烈《周清真佚詩補輯》復從《詩淵》中輯出周邦彥詩三首。¹⁴至於《全宋詩》所輯亦四十五首，其中五古十七首、七古

⁹ 宋陳郁(1184-1275)《藏一話腴》錄周邦彥《薛侯馬》、《天賜白》二詩云：「若此凡數百篇，豈區區學晚唐者可及耶？……擬清真者，又當於樂府之外求之。」見《藏一話腴》，《欽定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文淵閣本，1987年)，卷上，頁560；今據吳文治(1925-) (主編)：《宋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8812。

¹⁰ 元陳世隆編《宋詩拾遺》(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錄《越臺曲》、《鳳凰臺》兩首(頁229)。清厲鶚(1692-1752)《宋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得《過羊角哀左伯桃墓》、《鳳凰臺》、《春帖子》、《春雨》、《曝日》、《天賜白》六首(卷二八，頁724)。丁立中(1866-1920)輯《武林往哲遺著後編》(光緒庚子[1900]嘉惠堂刊本)增加《仙杏山》、《贈常熟賀公叔隱士》、《竹城》、《投子山》、《宿靈仙觀》、《芝朮歌》六首。

¹¹ 羅忼烈(1918-) (輯佚)：《周邦彥詩文輯存》(香港：一山書屋，1980年)。

¹² 唐圭璋(1901-1990)補輯者有《次韻周朝宗六月十日泛湖》五首、《二月十四日至越州，置酒泛湖，欲往諸刹，風作不能前》、《楚平王廟》、《越臺曲》八首。參《周清真佚詩補輯》，《大公報》(香港)《藝林》新一三一期(1981年1月25日)。案前六首原為趙萬里(1905-1980)據《永樂大典》卷二二七四「湖」字韻輯，即唐圭璋補後二首。

¹³ 羅忼烈(箋注)：《周邦彥清真集箋》(香港：三聯書店，1985年)。

¹⁴ 羅忼烈《周清真佚詩補輯》增多《壽朱守》二首、《壽陳運幹》一首。又有《壽叔父》一首，即《芝朮歌》，異文頗多。原刊香港《大公報·藝林》新五八三期，今據羅忼烈：《詞學雜俎》(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頁113-15。

八首、五律二首、七律九首、五絕二首、七絕七首。¹⁵ 尤以五、七言古體及七絕的成就最高。值得注意的是，周邦彥詩詞異體，風格各異，周詞固多婉媚之音，而周詩則見拗怒之氣。¹⁶ 周詞以寫情詠物為主，稍欠摹寫現實之作，可能隱含寄託，但失之隱晦，很難表現深刻的思想內容；而周詩詠史言志，酬唱寄情，譏刺時政，關懷民生，題材更趨廣泛。周詩寫出了文人的憂患意識，不類於歌詞裏面縱情聲色的音樂世界。

周邦彥詩反映社會現實，議論時局，尤深具諷刺意味，表現時代精神。神宗元豐四年（1081）八月，宋遣李憲（1043？-1093？）、种諤（1027-1083）、高遵裕（1027？-1086？）、劉昌祚（1023？-1090？）、王中正（1024-1094）等五路大軍伐夏。十月，夏米脂寨降。梁太后（？-1085）用老將之策：「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饋運。大兵無食，可不戰而困也。」¹⁷ 高遵裕至靈州，宋圍城十八日竟不能克敵，夏人決黃河水以灌宋營壘，宋軍乏食，餓死者甚眾，於是高遵裕軍潰。其他各路亦無功而還。元豐五年（1082）八月，宋又遣徐禧（1043-1082）築永樂城（陝西米脂）。夏傾舉國之兵三十萬來攻。城中缺水，士兵渴死大半；而沈括（1031-1095）、李憲的援軍亦無法到達。九月，永樂城陷，徐禧、李舜舉（？-1082）等蕃、漢官兵、役夫陣亡者二十餘萬，輜重損失無算。¹⁸ 消

¹⁵ 《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卷一一八八，頁13421-32。其中〈壽宋守〉一詩據《江西詩徵》卷一六改作〈壽宋守〉。

¹⁶ 王國維（1877-1927）〈清真先生遺事〉云：「今其聲雖亡，讀其詞者猶覺拗怒之中，自饒和婉，曼聲促節，繁會相宣，清濁抑揚，輾轉交往。兩宋之間，一人而已。」載《王國維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1983年），冊一一，頁二三。則周邦彥詞實亦兼具拗怒之氣者，不獨以詩為然，可供參考。

¹⁷ 參《宋史·外國傳二·夏國下》，卷四八六，頁14011；又明陳邦瞻（？-1623）（編）：《宋史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西夏用兵」條，頁390。

¹⁸ 張舜民（1033？-1112？）：〈〔永洛故城〕事記〉云：「乙丑歲〔元豐八年〕，西客有以永洛事語余者。」「被圍數日乏水，以至裂馬糞而飲。會天微雨，將士皆露立，以衣承焉，吮之而止渴，稍稍殺役夫啖之。禧令土工鑿數井，始有浸潤，士卒渴甚爭急，至者斬之不能止，尸蔽井旁。已而至于投井中以飲者，踰刻而填塞。其渴如此，凡八日。」「夜半虜兵四面急攻，先梯穴而入，士卒飢瘦羸不能復拒，因各潰散。舜舉自殺，禧、稷為亂兵所殺。將校惟曲珍、王湛、李浦獲免。逃歸者數千人，千人身皆被創。」「初珍之失馬危甚，忽有老人牽馬以授之，曰：『此曲太尉乎？』因得馳去。是役也，正兵及糧卒死者，凡十餘萬人，官吏將校數百人」。載《畫墁集》，原刊《永樂大典》（藏大英博物館）卷八〇八九「城」字韻，頁三下《元一統志》引；今據樂貴明（輯）：《四庫輯本別集拾遺》（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579-82；又參《全宋文》訂正字句（冊四一，頁764-68）。

息傳來，神宗涕泣悲憤，為之不食。¹⁹翌年(1083)夏兵圍蘭州不遂，夏主李秉常(1060-1086)上表請和。周邦彥撰〈天賜白〉譏刺曲珍(1029-1087)城陷敗走的狼狽情況。序云：「永樂城陷，獨王湛、曲真夜縋以出。真持木為兵，且走且敵。前陷大澤中，顧其旁有馬而白，暫騰上馳去，五鼓達米脂城，因以得脫。真名其馬為天賜白。蔡天啟得其事於西人，邀余同賦。」

君不見書生鑄羌勒兵入。羌來薄城束練急。蠟丸飛出辭大家，帳下健兒紛雨泣。鑿沙到石終無水。擾擾萬人如渴蟻。挽縲竊出兩將軍，虜箭隨來風掠耳。道旁神馬白雪毛。嚙口不嘶深夜逃。忽聞漢語米脂下，黑霧壓城風怒號。脫身歸來對刀筆。短衣射虎朝朝出。自椎雜寶塗箭創，心折骨驚如昨日。穀城魯公天下雄。陰陵一跌兵力窮。檣舟不渡謝亭長，有何面目歸江東。將軍偶生名已弱。鐵花暗澀龍文鏢。縞帳肥芻酬馬恩，閒望旄頭向西落。²⁰

七古六段，四句一換韻。曲真，《宋史》作曲珍，字君玉，隴干人，世為著姓，曲氏以材武長雄邊關。曲珍任鄜延路副總管。「徐禧城永樂，珍以兵從。版築方興，羌數十騎濟無定河覘役，珍將追殺之，禧不許。諜言夏人聚兵甚急，珍請禧還米脂而自居守。明日果至，禧復來，珍白：『敵兵眾甚，公宜退處內柵，檄諸將促戰。』禧笑曰：『曲侯老將，何怯耶？』夏兵且濟，珍欲乘其未集擊之，又不許。及攻城急，又勸禧曰：『城中井深泉竭，士卒渴甚，恐不能支。宜乘兵氣未衰，潰圍而出，使人自求生。』禧曰：『此城據要地，奈何棄之？且為將而奔，眾心搖矣。』珍曰：『非敢自愛，但敕使、謀臣同沒于此，懼辱國耳。』數日城陷，珍縋而免，子弟死者六人。亦坐貶皇城使。帝察其無罪，諭使自安養，以圖後效」。²¹ 由此可見徐禧用兵剛愎自用，屢誤戎機，不如老將曲珍能夠掌握戰場的形勢，迅速應變。

¹⁹ 《宋史紀事本末》「西夏用兵」條云：「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葭蘆、吳堡、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堡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痛悼，為之不食。自靈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括、諤進攻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遂致覆敗。自是帝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於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頁393)

²⁰ 陳郁：《藏一話腴》，頁8813。第二句「束練」，《欽定四庫全書》本(頁560)及《全宋詩》本(頁13424)均作「束縛」，疑誤。

²¹ 《宋史》，卷三五〇〈曲珍傳〉，頁11083-84。

周邦彥詩結構波瀾壯闊。首段被圍，書生指徐禧守永樂城，狂謀輕敵。²² 次段寫城中井深泉涸，士卒渴甚，惜徐禧不聽勸告，不肯棄城保存實力，獨王湛、曲真乃夜縋逃出。三段得神馬白雪毛歸宋。四、五段以李廣、項羽為喻，心折骨驚，顏面無存。六段譏刺敗軍之將惟以肥芻酬謝白馬救命之恩；旄頭喻胡星，徒然寄望胡星自行隕落，尤深具諷刺意味。據張舜民《畫墁集》所記，曲真失馬危甚，其後乃得老人牽馬相贈，而非詩中所說的天賜神馬。序文中的蔡天啟即蔡肇（？-1119），潤州丹陽人。《宋史》云：「初事王安石，見器重。又從蘇軾游，聲譽益顯。第進士，歷明州司戶參軍、江陵推官。元祐中，為太學正。……言者論其學術反覆。」²³ 米芾〈西園雅集圖記〉寫他在旁邊看東坡寫字，「幅巾青衣據方机而凝佇者為丹陽蔡天啟」。²⁴ 周邦彥另有〈天啟惠酥〉七律四首，乃答謝贈酥之作，其四末云：「絕知意重分餘棄，漸見詩多入怪迂。猶恐僮人笑風土，預從貝葉檢醍醐。」醍醐乃乳酪製品，味甘美。詩中除表示謝意外，兼有論詩意味，所謂「怪迂」指詠酥之作不同於一般的詩歌素材，乃借佛家醍醐灌頂為喻，顯出新意。

〈薛侯馬〉詩大約作於元豐七年（1084），周邦彥亦以宋夏議和為背景，借馬為喻，寫出失志的哀痛。序云：「薛侯河東土豪也，以戰功累官左侍禁。西方罷兵，薛歸吏部授官，帶所乘駱馬寓武城坊，經年不得調。羈馬廄屋下，馬怒，貶主人屋，時時蹄碎市販盜器，薛悉賣裝以償。傷已阨屈，因對馬以泣。鄰居李文士，因之為薛作傳。同舍賦詩者十一人，僕與其一焉。」這篇小序寫出戰馬的靈性，不甘投閒置散；而人馬對泣，尤為動人。詩云：「薛侯俊健如生獠。不識中原生土豪。蛇矛丈八長在手，駱馬蕃鞍雲錦袍。往屬嫖姚探虎穴。狐鳴蕭蕭風立髮。短韉淋血斬胡歸，夜斷堅冰濡馬渴。中都久住武城坊。屋頭養駱如養羊。枯其不飽籬壁盡，狹巷怒蹄盆盜傷。祇今棲棲守環堵。五月濕風柔巨黍。千金夜出酬市兒，客帳晝眠聽戲鼓。邊人視死亦尋常。笑裏辭家登戰場。銓勞定次屈壯士，兩眼熒熒收淚光。齒堅食肉何曾老。騙馬身輕飛一鳥。焉知不將萬人行，橫槊秋風賀蘭

²² 《宋史·徐禧傳》論云：「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猝與強虜遇，至於覆沒。」（卷三三四，頁10724）又參上文《宋史紀事本末》「西夏用兵」條，頁393。徐禧幼子徐俯（1075-1141）娶呂惠卿（1032-1111）女。李廌（1061-1111）《師友談錄》稱哲宗即位，「每讀責呂吉甫詔，至『力引狂生之謀，馴至永樂之禍』，未嘗不涕泣也」。參丁傳靖（1870-1930）（輯）：《宋人軼事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545。

²³ 《宋史》，卷四四四〈文苑傳六〉，頁13120。

²⁴ 米芾（1051-1107）：〈西園雅集圖記〉，載《寶晉英光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1年），〈補遺〉，頁154。

道。」²⁵ 七言六段，四句一換韻，結構平穩。首段摹寫薛侯人與馬的驃悍形象。次段寫往日殺敵斬胡立功，形象豪邁。三段為閒散憤慨，寫出馬的靈性。四段巨黍乃古之良弓，棄置不用，將軍晝眠夜出，虛耗生命。五段稱讚薛侯戰功彪炳，可惜銓勞定次，不復敘用，難免會使人質疑朝廷用人的標準。末段振起，寫出了時代的強音，仁宗景祐年間(1034-1037)，賀蘭山已為夏人佔領，橫槊秋風，收復失地，彷彿重振盛唐邊塞詩的雄風，同時亦不讓後來岳飛(1103-1142)「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及陸游(1125-1210)「鐵馬秋風大散關」的壯懷專美。

以上七古〈天賜白〉、〈薛侯馬〉兩首均由陳郁《藏一話腴》引錄並保留下來，論云：「若此凡數百篇，豈區區學晚唐者可及耶？」錢鴻瑛亦云：「這兩首詩的風格慷慨悲涼，豪氣逼人，金戈鐵馬之聲躍然紙上。詩中主人公的形象使人聯想起王維的名篇〈老將行〉，確是宋詩中近於唐音之佳作。」²⁶ 其實二詩均以馬為喻，除了表現寫實的力度之外，周邦彥更藉此嚴厲批評朝廷用人不當，喪師辱國，進退失據，極感沈痛。宋人專詠永樂城陷落的作品不多，周邦彥詩折射出歷史的采光，發揚蹈厲，表現史詩的博大氣派。

周邦彥的詠史詩充滿詭異的色彩，寫出了人世的苦澀感覺，韻味深長。哲宗元祐二年春(1087)，周邦彥出都任廬州(今安徽合肥)府學教授；四年秋(1089)赴荊州(今湖北江陵)任；八年(1093)二月知溧水縣；紹聖四年(1097)還京為國子主簿。周邦彥在溧水三年，詩詞較多。南宋強煥〈題周美成詞〉云：「而待制周公，元祐癸酉春中為邑長于斯，其政敬簡，民到于今稱之者，固有餘愛。而其尤可稱者，於撥煩治劇之中，不妨舒嘯，一觴一詠，句中有眼，膾炙人口者，又有餘聲洋洋乎在耳，則其政有不亡者存。」²⁷ 周邦彥〈過羊角哀左伯桃墓〉五古一首，一韻到底。墓地在溧水縣南，他利用傳說渲染，寫朋友交誼十分壯烈。

古交久淪喪，末世尤反覆。谷風歌焚輪，黃鳥譬伐木。永懷左與羊，重義踰血屬。客行干楚王，冬雪無斗粟。傾糧活一士，誓不俱死辱。風雲為慘變，鳥獸同躑躅。角哀哭前途，伯桃槁空谷。終乘大夫車，千騎下棺櫛。子長何

²⁵ 參陳郁：《藏一話腴》，頁8812。此詩異文頗多，《欽定四庫全書》本「庫屋」作「庫屋」，「阨屈」作「阨屋」，「長在手」作「常在手」，「斬胡」作「斬將」，「夜斷」作「夜斲」，「濕風柔巨黍」作「樵風吹宿莽」，「騙馬」作「騎馬」，又「鄰居李文士因之」句中缺「士因」二字(頁560)；《全宋詩》異文相同(頁13423)，其中有些明顯是錯字。

²⁶ 錢鴻瑛(1930-)：《周邦彥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15。

²⁷ 宋強煥：〈題周美成詞〉，載明毛晉(1599-1659)(輯)《宋六名家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中《汲古閣鑄鑄片玉詞》，頁177。

所疑，舊史刊不錄。獨行貴苟難，義俠輕殺戮。雖云匪中制，要可興薄俗。荒墳鄰萬鬼，湔死皆碌碌。何事荊將軍，操戈相窘逐。²⁸

《後漢書·申屠剛傳》李賢注引《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為死友，欲仕於楚。道阻，遇雨雪不得行。飢寒，自度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以上卿禮葬伯桃。角哀夢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正苦荊將軍冢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以決勝負。』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冢，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²⁹《六朝事跡編類》「左伯桃墓」條云：「《烈士傳》曰：左伯桃、羊角哀，燕人也。二人為友，同時遊學。聞楚王待士，乃同入楚。至梁山，值雨雪，糧少，伯桃乃併糧與角哀，令往事楚，自入于空樹中餓死。角哀至楚為上大夫，乃告楚王備禮葬左伯桃于此。唐大曆六年，魯公顏真卿經此，以詩弔之，書於莆塘，在溧水縣南四十三里。」又「荊將軍廟」條云：「舊經：荊軻廟也。《烈士傳》曰：昔左伯桃、羊角哀往楚，併糧于梁山，左伯桃死而角哀達，乃厚葬伯桃于梁山下。一夕，角哀夢伯桃告曰：幸感所葬，奈何與荊將軍墓相鄰。每地下與吾戰，為之困迫。今年九月十五日，將大戰。至時望子借兵馬于冢上叫噪相助。角哀覺而悲之，如期而往，曰：今在冢上，安知我友地下之勝負。乃命開棺，自刎而死，報併糧之義也。廟在溧水縣南四十五里。」³⁰

根據上引兩則傳說，左伯桃墓與荊將軍廟相距僅二里，竟然約期大戰，而羊角哀為知己助陣，亦自刎而死，以報併糧之義。傳說荒誕不經，而墓中約戰、自殺相從的情節更充滿詭異的氣氛，是以司馬遷(前145-86?)並沒有採入《史記》之中。而周邦彥詩則重塑整段的古史，一方面刻劃相知之感，為知己助陣；一方面又基於朋黨立場，敵我分明，希望荊將軍不要操戈相逐，留有餘地。三人都是傳說中忠肝義膽的英雄，不同於一般普通庸碌的死者，彼此惺惺相惜，何必大動干戈。此詩無意中透露出北宋黨爭的慘烈現實，意深思苦，惹人遐想。弔古傷今，別具一格。可惜此詩盲目歌誦友情，以死相激，甚至激化矛盾，談不上振起薄俗。

周邦彥〈楚平王廟〉五古一首，一韻到底。此詩乃借題發揮之作，批評伍子胥(?-前484)激烈的復仇意識。詩云：

²⁸ 首句《全宋詩》作「古交」(頁13423)，《周邦彥清真集箋》作「古道」(頁310)。

²⁹ 南朝宋范曄(398-445)(撰)、唐李賢(651-684)(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卷二九，頁1015。

³⁰ 宋張敦頤(編)、明吳琯(校)：《六朝事跡編類》(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卷下，頁244，222。

奸臣亂國紀，伍奢思結纓。殺賢恐遺種，巢卵同時傾。健雛脫身去，口血流吳廷。達士見幾微，楚郊憂苦兵。十年軍入郢，勢如波卷萍。賢亡國嬰難，王死屍受刑。將隳七世廟，先壞百里城。子胥雖捐江，素車駕長鯨。驚濤寄怒餘，遺廟羅千楹。王祠何其微，破屋風泠泠。蟄蟲陷香案，飢鼠懸燈檠。淫俗敬魑魅，何人顧威靈。臣冤不讎主，況乃鋤丘塋。報應苦不直，吾將問冥冥。³¹

《六朝事跡編類》「楚平王廟」條云：「《吳越春秋》云：楚平王都于固城，廟今在溧水縣南九十里。……至平王用佞臣之言，殺太傅伍奢并其子尚。子胥奔吳，吳用之，破楚而入郢。此廟即平王之舊址也。唐廣明元年重修。」³²又史稱伍子胥掘楚平王墓，鞭之三百，以報父兄之仇。伍子胥嘗勸吳王夫差（?-前473）滅越，夫差不聽，反而賜伍子胥死。伍子胥遺言要抉眼懸掛於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兵入城。夫差聞之大怒，乃取伍子胥屍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傳說伍子胥化為錢塘江潮，素車白馬，興風作浪。民間立祠祭祀，以釋怨恨之意。此詩將傳說中兩則有關伍子胥的復仇故事融為一體，夾敘夾議，發揮報應之說。「結纓」喻伍奢（?-前522）從容赴死，典出子路（前542-480）故事；而「巢卵」則以孔融（153-208）被收為喻，指伍子胥知機脫身遁去。³³首段至「先壞百里城」止，刻劃伍子胥和楚平王的深怨。次段由「子胥雖捐江」至「何人顧威靈」止，則寫伍子胥自殺後強烈的復仇意願，居民為保平安，立廟祈福；而楚平王廟沒有威靈，乃變成蟄蟲飢鼠的荒涼世界。人情冷熱不同，對比深刻。末段四句宣揚報應之說，指斥伍子胥掘墓的錯誤。「臣冤不讎主」是全詩主題所在，意存忠厚，議論得體。

以上〈過羊角哀左伯桃墓〉、〈楚平王廟〉五古二首都是利用古史傳說入詩，情節荒誕，但周邦彥借題發揮，自有託意。錢鴻瑛云：「其憤懣不平之氣躍然紙上。」³⁴

³¹ 參《全宋詩》，頁13425。《周邦彥清真集箋》「苦兵」作「苦辛」，「賢亡」作「賢王」，「將隳」作「將毀」，「讎主」作「仇主」（頁312）。論押韻及詩意，似以前者為勝。

³² 《六朝事跡編類》，頁217-18。

³³ 《左傳·哀公十五年》：「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見《春秋左傳注疏》，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刊《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1955年），卷五九，頁1036。《世說新語·言語》：「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罪冀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見劉義慶（403-444）（著）、劉孝標（462-521）（注）、余嘉錫（1884-1955）（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58。

³⁴ 《周邦彥研究》，頁17。

可見還是以現實人生為主調，思想深刻。周邦彥〈天啟惠酥〉亦云：「漸見詩多入怪迂。」怪迂其實也就是一種生澀怪異的風格，不隨流俗，突出自我，富有創意。

周邦彥詞政治的寓意不多，但他的詩卻鋒芒畢露，議論深刻。〈開元夜遊圖〉可抵一篇唐玄宗(李隆基，685–762)的小傳，甚至更藉小序帶出深刻的社會內容，警剔庸人崛起，燕安酖毒之害。序云：「唐景龍中，明皇自潞州別駕來朝，遂留京師。中夜發策，引萬騎以安宗社，易如振臂，其英叡之姿，凜然可想。當是時，如王毛仲、李宜德，皆以騎奴執箠房從事。一旦乘天威，相附麗以起，韋杜之間，獵師酒官，封官賜第，賞賚華渥，後宮游燕，未嘗不與。然皆庸人崛起，不得與佐命中興之士比。寵榮極矣，猶鞅鞅觫望，其後多被誅，或貶以死。向使君臣無忘艱難，以相戒敕，則諸臣各保世寵，而天寶之禍，必不至魚爛如此。古人以宴安為酖毒，豈虛也哉！此本李公麟所摹，乃歐陽氏舊物也。」周邦彥揭示開元政局糜爛的原因，自然是影射現實政治，直接指向徽宗朝北宋末世的浮靡風氣了。詩云：

潞州別駕年十八。彎弓射鹿無虛發。真龍絕水魚鱉散，參軍後騎鳧鷖沒。咸原瑞氣映壺關。城南書生知阿瞞。解鞍下馬日向夕，炙驢行酒天為歡。坐上何人識天意。擲帽破靴朝邑尉。旄頭夜轉紫垣開，太白光芒黃鉞利。萬騎齊呼左右分。將軍夜披玄武門。塵兵三窟盡妖黨，問寢五門朝至尊。羽林蕭蕭參旗折。太極瑤光淨煙雪。殺身志在攀龍鱗，唾手成功探虎穴。麾下且侯李與王。輕形玉帶持箠房。晉文賞功從悉錄，漢光道舊情無忘。與宴宮中張秘戲。複道晴樓過李騎。連催羯鼓汝陽來，一抹鯤弦薛王醉。玉階淒淒微有霜。天雞喚仗參差光。宜春列炬散行馬，長樂疏鐘嚴曉妝。清絲急管歡未畢。瑤池八馬西南出。捫參歷井行道難，失水回風永相失。君不見當時韋杜間。呼鷹走狗去不還。坐間年少莫大語，臨淄郡王天子父。³⁵

七古十段，四句一換韻。上半首五段，首段摹寫唐玄宗的英姿和天威。次段寫玄宗交結禁軍豪士發難，咸原即咸陽，壺關即宮中禁道，城南書生即劉幽求，授朝邑尉，阿瞞乃玄宗小名。三段暗示祥瑞，紫垣喻宮禁，太白即金星，兆戰伐。四、五段宮闈喋血，玄宗誅殺韋后及其同黨，立相王為帝，是為睿宗(李旦，662–716)。未幾睿宗遜位於玄宗。下半首亦五段，全力渲染遊樂之盛，而隱含譏刺之意。六段寫玄宗封賜諸臣，李宜德、王毛仲原為玄宗奴僕，驍勇善騎射，事平後

³⁵ 參《周邦彥清真集箋》，頁346。「壺關」指宮禁，《全宋詩》作「壺關」，誤；又「與燕」作「與宴」(頁13428)，兩可。

拜為將軍；箛房即盛矢器。七段近鏡特寫，秘戲乃男女淫褻表演，李騎即李宜德；汝陽郡王李璿（？-750）精於羯鼓，薛王李業乃玄宗弟，鯤弦即琵琶。八段則為遠景，從高角度俯瞰長安的宮殿，宜春苑乃宮中歌妓之所居，顯示酒闌歌罷的淒清場景，鬧中取靜，給讀者反省及思考。九段寫天寶之禍，捫參歷井形容蜀道的崎嶇，失水回風，盛世不復。末段乃回憶情節，有警世作用。韋曲杜曲在長安城南，呼鷹走狗喻李、王之徒，庸人奴僕，乘時崛起，反而壓抑了真正的人才；而末句則把矛頭直指玄宗，雖然父、祖貴為天子，亦不應狂言大語，胡作妄為。

《宋史》稱蔡攸得寵，「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媠謔浪語，以蠱帝心」。³⁶又李邦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事，應對便捷；善謳謔，能蹴鞠。每綴街市俚語為詞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³⁷凡此皆與周邦彥詩中所描述的情節彷彿相似，而歷史的荒謬一再出現，借古刺今，語語沈痛。李公麟（1049-1106），字伯時，舒城人。《東都事略》云：「公麟能行草書，善畫，尤工人物，人以比顧、陸云。元符三年〔1100〕，病脾，遂致仕。既歸老，肆意於泉石間，作〈龍眠山莊圖〉，為世所寶藏。」³⁸此詩藉觀畫影射徽宗朝荒淫腐朽的現象，深具諷世意味。案唐玄宗挑起安史之亂，而宋徽宗則有靖康之難，都因耽於逸樂，導致國亡家破，老百姓遭遇劇變，流離失所，歷史的悲劇發展驚人相似。〈開元夜遊圖〉一詩足以顯示周邦彥的識見，憂生念亂，指出災難很快就會降臨。其實王安石亦有〈開元行〉七古一首，所謂「一朝寄托誰家子。威福顛倒誰復理」。³⁹借古諷今，帶出用人不當的主題，以議論為主，而失之枯槁。周邦彥〈開元夜遊圖〉的主題及取材幾乎完全一致，但流動圓轉，絢麗多姿，深具唐詩的風神，議論得體，批判現實，兼融宋詩的典實，似乎就高於王安石〈開元行〉一詩了。

周邦彥博涉百家之書，學養精湛，其詩往往都能別出新意，很多不適宜在歌詞裏表現的素材，在詩中可能就顯得駕輕就熟了。周邦彥詩充滿詭異的冷色，具有生澀的效果，出乎讀者意料之外，推陳出新，而這也是宋詩一貫的基調。例如〈鳳

³⁶ 《宋史》，卷四七二〈姦臣傳二·蔡攸〉，頁13731。

³⁷ 同上注，卷三五二〈李邦彥傳〉，頁11120。

³⁸ 王稱：《東都事略》，卷一一六〈文藝傳〉，頁1014。

³⁹ 王安石（1021-1086）〈開元行〉云：「君不聞開元盛天子，糾合雋傑披奸倡。幾年辛苦補四海，始得完好無疽瘡。一朝寄托誰家子。威福顛倒誰復理。那知赤子遍愁毒，只見狂胡倉卒起。茫茫孤行西萬里，逼仄歸來竟憂死。子孫險不失故物，杜稷陵夷從此始。由來犬羊著冠坐廟堂。安得四鄙無豺狼。」見宋李壁（注）、李之亮（補箋）：《王荊公詩注補箋》（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頁232。

鳳臺〉及〈越臺曲〉都是知溧水縣時的作品，〈鳳凰臺〉七絕云：「危臺飄盡碧梧花。勝地淒涼屬梵家。鳳入紫雲招不得，木魚堂殿下飢鴉。」⁴⁰《六朝事跡編類》「鳳臺山」條云：「宋元嘉中，鳳凰集于是山，乃築臺于山椒，以旌嘉瑞，在府城西南二里，今保寧寺是也。」⁴¹唐代李白(701-762)〈登金陵鳳凰臺〉之作，氣象高華。宋代鳳凰臺仍在保寧寺內，而周詩則刻意折射出淒清的異色。杜甫(712-770)〈秋興八首〉有「碧梧棲老鳳凰枝」之句，而碧梧落盡，則鳳凰已無枝可棲了。第三句亦「鳳去臺空」之意，而僅見飢鴉，意境空寂。此詩由李、杜的詩意中轉出新意，不露痕跡。

〈越臺曲〉云：「玉顏如花越王女。自小嬌癡不歌舞。嫁作江南國主妃，日日思歸淚如雨。江南江北梅子黃。潮頭夜漲秦淮江。江邊雨多地卑濕，旋築高臺勻曉粧。千艘命載越中土。喜見越人仍越語。人生腳踏鄉土難，無復歸心越中去。高臺何易傾。曲池亦復平。越姬一去向千載，不見此臺空有名。」⁴²越臺在建康城南江寧尉廨後。《六朝事跡編類》云：「春秋時越既滅吳，盡有江南之地，於是築城江上，以鎮江險。《圖經》云：周回二里八十步，在秣陵縣長千里。……今南門外有越臺，與天禧寺相對，見作軍寨處是也。」⁴³詩中的「越王女」或以為西施。《吳越春秋》云：「乃使相工索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蠡進曰：『越王勾踐竊有二遺女。越國洿下困迫，不敢稽留。謹使臣蠡獻之大王，不以鄙陋寢容。願納以箕帚之用。』」⁴⁴惟傳說中吳王所築者姑蘇之臺，上別立春霄宮，為長夜之飲，乃在蘇州而不在金陵，因此與周邦彥詩中越臺的背景不盡相同。此詩借「越王女」的遠嫁，以抒望鄉之情。周邦彥亦越人，自然更容易引發共鳴了。越王女要用越土築臺，喜見越人仍越語，從而使一個古老的傳說帶出濃烈的鄉情。這是一首七言古詩，共分四段，仄平相間協韻。首段遠嫁思歸；次段寫秦淮河的卑濕，渲染氣氛；三段深化思越之情；四段用了五言兩句，議論宇宙人生，同時也抒發了歷史與現實之間的悠悠無盡之情。此詩似亦有意仿效王安石〈明妃曲〉之作，除了古詩的結構相似之外，而構思奇警，立意新穎，其實也是各有千秋的。王安石稱「人生失意無南北」，「人生樂在相知心」，借昭君的和番故事抒發個人不遇的情懷，

⁴⁰ 首句諸本皆作「飄盡」，《宋詩拾遺》作「落盡」（卷一五，頁229）。

⁴¹ 《六朝事跡編類》，頁140。

⁴² 《周邦彥清真集箋》次句作「嬌癡」（頁320），《宋詩拾遺》作「嬌癡」（頁229），《全宋詩》同（頁13424），當為錯字。

⁴³ 《六朝事跡編類》，頁84。

⁴⁴ 周生春：《吳越春秋輯校匯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147。

今古神魂相通，引發深刻的共鳴。而周邦彥「人生腳踏鄉土難」，更是虛擬故事，一空依傍，將鄉愁的主題發揮得淋漓盡致。

周邦彥詩鑄鍊字句，意境空靈。〈次韻周朝宗六月十日泛湖〉五首，其一「兩槳入菰蒲，鳧鷖欸驚散」，其二「洲涼扇荷簑，山晚雲垂幔」，其三「何當飲清光，乘月行夜半」等，機鋒振發，令人神往。他如「古今何足云，浩劫同一息」（〈謾成〉二首之一），「石瀨光洄洄，沙步平佻佻」、「藩籬曲相通，窈窕花竹靜」（〈無題〉），幽姿靜態，氣象萬千，渲染山川景色，富有表現力。〈楚村道中〉二首或為荊州作，⁴⁵其一七律云：「林棲野啄散鴉群。極目風霾亂日曛。短麥離離乾憶雨，遠峰黯黯細輪雲。愁逢雜路尋車轍，賴有高林出酒巾。輒得問津凡父老，不應看客廢鋤耘。」此詩旅途雜感，硬語盤旋。首聯旅途雜景，風塵僕僕。頷聯寫萬里晴空，憶雨輪雲，刻劃細緻。頸聯酒巾即酒旗，歧路徬徨，有柳暗花明之妙。末聯化用《論語·微子》的故事，長沮桀溺偶而耕，子路問津，他們耨而不輟。⁴⁶周邦彥問津卻責怪父老看客，反其意而用之，頗有調侃意味。錢鴻瑛云：「此詩看來是外放作官時所寫，筆力雄健。寫農村蕭瑟景象，細膩生動，琢句鍊字之功可見。」⁴⁷其二五古寫雨過天青，「往時解鞍地，醉墨棲壞壁。孤星探先出，天鏡小摩拭。比鄰忽喧呼，夜磔魯津伯」。尤覺清新可愛，但寧靜中忽然傳來殺豬的慘叫聲，出人意表。白敦仁云：「此詩寫景狀物，戛戛獨造。……詩中用『魯津伯』，指豬，事見《符子》，用事新警。」⁴⁸

〈謾書〉三首，其一五律云：「窗影蠅飛見，簾花照日成。汗餘胡粉薄，香度越羅輕。書葉蠶頭密，調笙鳳味鳴。情來愁不語，極目雁南征。」⁴⁹鮮豔亮麗，深具詞味。首聯窗前靜境，表現等待。頷聯寫美人的豔光。頸聯寫字吹笙，意態嫺雅。末聯遠望，含蓄意厚。錢鴻瑛認為此詩「是寫閨情的代言體，以五律的體裁寫得典麗、工整。……其特點更近於宋詩而不似唐音之重神韻」。⁵⁰

⁴⁵ 白敦仁(1918-)：〈周邦彥〉，載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所(編)：《中國歷代著名文學家評傳》第三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4年)，頁314。

⁴⁶ 《論語·微子》：「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耨而不輟。」見《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本，卷一八，頁165。

⁴⁷ 《周邦彥研究》，頁20。

⁴⁸ 白敦仁：〈周邦彥〉，頁314。

⁴⁹ 《周邦彥清真集箋》，頁339。《全宋詩》次句作「簾花日照成」(頁13426)。

⁵⁰ 《周邦彥研究》，頁21。

七絕〈春雨〉云：「耕人扶耒語林丘。花外時時落一鷗。欲驗春來多少雨，野塘漫水可回舟。」此詩以春雨為題，前二句寫出耕人的期望，以及鷗鳥的喜悅之情。末二句則寫出雨勢之大，而野塘漫水，也可以浮動一條小船了。表面上只是寫春景，其實卻也蘊含深刻的言外之意。例如天地蒼茫，為甚麼就只剩下「一鷗」呢？這顯然是有點代入自我的形象了；又如「回舟」之「回」，如果不嫌附會，其實也可以暗示春水方生，而有回歸自然之意。這與〈渡江雲〉詞中「千萬絲、陌頭楊柳，漸漸可藏鴉」之句有異曲同功之妙，希望尋覓託身之所。周邦彥在〈二月十四日至越州，置酒泛湖，欲往諸剎，風作不能前〉詩又云：「疾風已戒早回舟。」感覺天氣變化，帶出憂患意識。周邦彥一再使用「回舟」的意象，似是從李商隱(813-858)〈安定城樓〉詩中「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一聯化出，由璀璨歸於平淡。大抵此詩從側面落筆，含蓄清新，至於是否有所寄託，暗示政治氣氛的改變，那只能留待讀者的想像和玩味了。

周邦彥生當北宋末期黨爭激蕩之際，由於他曾兩獻〈汴都賦〉稱讚新法，奇辭壯采，深受新黨中人的器重，所以仕途亦每隨新黨的升沈而進退，相對平順。但他似乎並不熱中於功名富貴，奔走於權貴之門；⁵¹ 晚年還帶點內向怕事的性格，這在他很多的詩詞作品中往往都能表現出來。樓鑰云：「公壯年氣銳，以布衣自結於明主。又當全盛之時，宜乎立取貴顯；而考其歲月仕宦，殊為流落，更就銓部，試遠邑。雖歸班於朝，坐視捷徑，不一趨焉。三綰州麾，僅登松班而旅死矣。蓋其學道退然，委順知命，人望之如木雞，自以為喜，此又世所未知者。」⁵²

周邦彥詩多歌頌神仙道教，他最大的希望就是歸隱名山，參透世情，恬退保身。例如「本非民土宰官身，欲斷人間煙火穀」(〈仙杏山〉)、「深顰畏軒冕，自謂山林寬」(〈懷隱堂〉)、「豈饒蒿目憂世事，黃金縮腰埋土囊」(〈晚憩杜橋館〉)，很明顯的都是言志之作，寫出富貴的虛幻，流露出一剎的穎悟。〈遠遊〉五古二十句，一韻到底，詩云：「淮西渡兩槳，江左隨一鷗。苦嗟波濤窄，所至膠吾舟。借問舟中人，流轉何時休。帆高風色利，欲止不自由。傳聞弱水外，鼎立三神丘。鼓柁未

⁵¹ 周密(1232-1298)《浩然齋雅談》(《欽定四庫全書》本)云：「上喜，意將留行。且以近者祥瑞沓至，將使播之樂府。命蔡元長微叩之，邦彥云：『某老矣，頗悔少作。』」(卷下樂府，頁851)又參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232。周邦彥固少頌聖貢諛之詞，但卻有詩「化行禹貢山川內，人在周公禮樂中」歌頌蔡京，薛瑞生、孫虹訂為政和六年(1116)正月十七日蔡京七十歲生日賀壽之作。參〈清真事蹟新證〉，頁86-87；《清真集校注》，頁61。薛瑞生、孫虹列出周邦彥依附蔡京的證據尚多，可參看。

⁵² 〈清真先生文集序〉，頁475。

可到，載行有潛蚪。扶桑睹浴日，陽精熱東流。萬族呈秘怪，九土皆飄浮。送者安在哉，吾往不可求。豈比鷗夷子，並湖名遠遊。」⁵³〈遠遊〉借用《楚辭》名篇，發揮想像，情韻動人。詩分兩段，首段四韻，寫生命中的膠著狀態；羅忼烈云：「詩有淮西、江左之語，復多危苦之辭，疑是教授廬州前後作。」後段弱水、神丘則是游仙詩的筆調，郭璞(276–324)、李白詩中都有類似的描寫；九土即九州，秘怪紛呈，大開眼界。末二句仰慕范蠡的高情，周邦彥明白無法突破個人的局限，只求在湖內遠游，優悠自足。次句「一鷗」的意象亦屬自我寫照，同於〈春雨〉詩中的「花外時時落一鷗」，而有孤獨不群之意。陳鴻瑛云：「此詩似係離開廬州之作，詩中首言渡淮，次以具體的比喻形象，感傷行役之苦，對現實不滿之情溢於言表。接下去……，這裏有豐富的想像，充滿對神仙世界的嚮往。」⁵⁴白敦仁云：「此詩兀傲俊爽，充滿積極浪漫主義情調，反映了清真風格的另一側面。」⁵⁵

又〈夙興〉五古二十二句，一韻到底，詩云：

瞳瞳海底日，赤輝射東方。先軀歛群翳，微露不成霜。早寤厭床第，起步東西廂。引手視掌紋，黯黯未可詳。念此閱人傳，三年得跽藏。弛擔曾幾時，茲焉忽騰裝。問今何所之，意行本無鄉。晨鐘神慘悲，夜鼓思飛揚。與俗同一科，何異犬與羊。平明催放鑰，利害紛相攘。顛倒走群愚，豈但渠可傷。⁵⁶

詩分三段，前段十句寫日出景色，早起無聊，不能復睡，乃檢視掌紋及相書，皆以伏藏三年為誠。中段八句，由「弛擔曾幾時」開始，意欲放下人生的重擔，整裝出發，讓精神馳飛於「本無鄉」之中，暮鼓晨鐘，發人深省，如果委屈從俗，實與牛羊的生涯無異。末段四句，「鑰」為關門的橫木或鎖鑰，放鑰寫日出之後開門所見，名韁利鎖，是非顛倒，非但悲憫眾生，其實更具自憐之意，充份表現出對生命的迷惑和無奈，意深辭苦，自具警世意味，而這自然也是周邦彥的悟道之作了。他如〈贈常熟賀公叔隱士〉、〈芝朮歌〉、〈下帷齋〉、〈游定夫見過哺飯既去燭下目昏不能閱書感而賦之〉、〈宿靈仙觀〉諸詩，以及〈滿庭芳〉「夏日溧水無想山作」、〈紅林擒〉二闕、〈鶴沖天〉「溧水長壽鄉作」等詞，安時處順，樂由心生，均是深染道風

⁵³ 《全宋詩》，頁13429。其中「扶桑睹浴日」一句，《周邦彥清真詞箋》「睹」作「觀」（頁351）。

⁵⁴ 《周邦彥研究》，頁29。

⁵⁵ 白敦仁：〈周邦彥〉，頁316。

⁵⁶ 《全宋詩》，頁13428。《周邦彥清真詞箋》「黯黯」作「黯黯」（頁344）。

之什。羅忼烈說「溧水的道教風氣影響了他的人生觀」，⁵⁷ 呂陶說周邦彥的父親周原「家有藏書」，「晚習導引衛生之經」。⁵⁸ 溧水的宗教氣氛適與周邦彥家族血統中的遺傳因子相配合，為了在複雜多變的政治環境中明哲保身，很自然的就迫使詩人走上收斂及退隱之途了。

論周邦彥在北宋文壇的地位

王國維原本不喜歡《清真詞》，嘗云：「美成詞多作態，故不是大家氣象。」「予於詞，……而不喜美成」。其後譽之為：「而詞中老杜，則非先生不可。」甚至說：「兩宋之間，一人而已。」最後還把他推上宋詞第一的寶座，抑揚之間，落差甚大，難免令人有意外之感，但這卻是王國維嚴肅治學的成果。《清真先生遺事》分事蹟、著述、尚論、年表四部份，逐條檢視資料，理據充足，成就卓著，以科學的態度改變昔日之我，值得敬重。⁵⁹

周邦彥以詞鳴，其實還兼擅詩、文、賦等各類文體，即如歐陽修（1007–1072）、王安石、蘇軾（1037–1101）、秦觀（1049–1100）等都是兼備眾體的，文章講求治道，詩以言志，詞以娛情，而這也是北宋作家的普遍現象。不過，當時周邦彥卻僅以〈汴都賦〉得享盛名，連受神宗、哲宗、徽宗三朝的賞識，一獻再獻，拔擢遷升，官運亨通；⁶⁰ 所以呂陶在〈周居士墓誌銘〉中也提到獻賦任官之事，「諸生莫不榮願焉」。不過，〈汴都賦〉乃以歌頌新法為主，這使他很自然的走近新黨一

⁵⁷ 羅忼烈：〈周邦彥三題〉，載羅忼烈：《兩小山齋雜著》（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4年），頁163。文中所論三題為「風流文士形象的來源」、「新舊黨爭中的政治立場」、「道家思想的來由」。

⁵⁸ 呂陶：〈周居士墓誌銘〉，載《淨德集》，頁285。

⁵⁹ 參羅忼烈：〈王國維與清真詞〉，載羅忼烈：《兩小山齋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06–16。案王國維《人間詞話》原刊《國粹學報》四卷10–12期（1908），今所引前兩條見《人間詞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附錄〉，頁260。陳乃乾（1896–1971）錄自觀堂舊藏《詞辨》眉間批語；後兩條錄自《清真先生遺事》，亦見《人間詞話·附錄》，頁251，253。又蔣英豪（1947–）云：「《清真先生遺事》之作，看來像是對兩年前所作的『倡伎』的比喻的懺悔。環境變了，治學的興趣變了，對詞學原始資料接觸多了，對文學功能的看法也有所不同了，他更能謙虛地面向傳統，體會前代評論家稱美周邦彥的用心。」見蔣英豪：〈論王國維對周邦彥詞評價的轉變〉，《中華文史論叢》第七十四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35–36。

⁶⁰ 參薛瑞生、孫虹《清真事蹟新證》之〈周邦彥年表〉。周邦彥一生官運由不入流、入流為選人判司簿尉等（從九品），以至磨勘轉官、超轉，卒於通議大夫（正四品），卒贈宣奉〔下轉頁219〕

邊，漸漸也就跟舊黨中人不相往來了。呂喬年〈太史成公編《皇朝文鑑》始末〉云：「周美成〈汴都賦〉，亦未能侈國家之盛，止是別無作者，不得已而取之。若斷自渡江以前，蓋以其年之已遠，議論之已定，而無去取之嫌也。」⁶¹可見南渡之後，大家對周邦彥的新黨身份還是有所忌諱的，只是〈汴都賦〉在宋文中是無可替代的作品，不得不選。北宋文壇後期由蘇軾等領導風騷，元祐以後更是蘇軾及其門下諸子的盛世，他們在政治上雖然迭受打擊，但文學成就驕人，天下知名，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連新黨中人也忌恨在心，必欲除之而後快。

周邦彥的叔父周邠(1036–1111?)與蘇軾乃莫逆之交。熙寧四年至七年(1071–1074)，蘇軾在杭州通判任上，經常與周邠聯袂出遊，飲宴賦詩。張先(990–1078)、僧道潛亦有詩寄周邠。⁶²當時周邦彥十六歲，如果住在錢塘故里，尚未出外遊歷，應該有機會見到蘇軾。又呂陶為周家撰〈周居士墓誌銘〉，說不定也是由周邠請託的。周邠因烏臺詩案受到牽連，後來還一度被列入「元祐黨人」之中，而蘇軾又名滿天下，周邦彥是沒有理由不認識蘇軾的，可是他們之間並沒有片言隻字的交往，除了政治立場的隔閡之外，我們再找不到更好的解釋了。吳熊和云：「周邠後改任樂清令、管城令、溧水令，元豐八年後知吉州，一直與蘇軾詩郵不絕。但周邦彥作為故人子弟，卻與蘇軾絕無通問。這或許是一個跡象，表明他與蘇軾之間存在著某種障礙。」⁶³沈松勤亦云：「元豐八年，蘇軾還朝，元祐元年，在蘇軾的舉薦下，黃庭堅、張耒、晁補之分別為集賢校理、太學錄、太學正，元祐二年，秦觀亦因蘇軾舉荐賢良方正入京，『蘇門諸子』一時會聚京師，而周邦彥自元豐二年以來，一直身居太學，元祐二年才離京任廬州教授。所以，在元豐八年至元祐二年的三年間，蘇軾包括『今代詞手秦七黃九』與在詞學上功底深厚，且潛力甚大的後學周邦彥有著大量面交的時間和機遇，但卻彼此不相知聞。」⁶⁴此

〔上接頁218〕

大夫(正三品)，可見一生都在遷升之中。薛氏等論云：「據此則邦彥在神、哲兩朝乃循資升遷，至徽宗朝尤在蔡京當國期間，常常超轉，故職事官品高於寄祿官品，觀此表則可了然於目。」(《新宋學》，頁109；《清真集校注》，頁106)

⁶¹ 宋呂祖謙(1137–1181)：《皇朝文鑑》，《四部叢刊》影常熟瞿氏藏宋本，卷首。

⁶² 劉揚忠(1946–)指出：「《永樂大典》卷八百九十九尚存張先絕詩〈酬周開祖示長調見索詩集〉一首，《咸淳臨安志》載參寥子〈次韻周開祖大夫泛湖見訪〉七律一首。」見劉揚忠：《周邦彥傳論》(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7。

⁶³ 吳熊和(1935–)：〈負一代詞名的集大成者周邦彥〉，載吳熊和(主編)：《十大詞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91。

⁶⁴ 沈松勤(1957–)：《北宋文人與黨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214。

外，儘管周邦彥並沒有名列新黨正人之中，也沒有參與大晟府的製樂，⁶⁵ 卻在徽宗朝中步步高升，仕途順利。大觀元年至四年（1107–1110），周邦彥任宗正少卿兼議禮局檢討，撰製《大觀五禮》，製禮而不作樂，看來也脫不了與蔡京的密切關係。周邦彥與舊黨中人自然是不便往還了。⁶⁶

蘇門中人對周邦彥的評價基本上也是正面的。陳郁說：「當時以詩名家如晁、張，皆自歎以為不及。」可能只是傳聞之辭，誇張失實。從現存的文獻中，我們可沒有證據證明晁補之（1053–1110）、張耒（1054–1114）說過這樣的話。此外，羅忼烈引陳師道（1053–1102）《後山詩話》云：「美成箋奏雜著俱盛，惜為詞掩。」⁶⁷ 注稱出沈雄《古今詞話》引《後山詩話》，可是現在以上二書都無法檢出覆核這條資料。這幾位蘇門學士都只比周邦彥大兩三歲而已，可說是同輩中人，要說幾句讚美周邦彥的話也很普通，然而這幾條資料就是找不到出處，也就不見得可靠了。元豐年間，周邦彥在詩中曾經提及蔡肇、李公麟等，蔡肇先後隨王安石及蘇軾遊，當時可能還未進入蘇門；至於李公麟摹本的「開元夜遊圖」，周邦彥只是看畫而已，並沒有說明二人有任何來往。除了上述的資料以外，北宋文壇再也沒有有關周邦彥的記載了，好的壞的都沒有。政和二年（1112），劉曷（1062？–1118？）為戶部尚書，兼任大晟府提舉。劉曷嘗薦周邦彥自代。⁶⁸ 至於其他資料全都要到南渡之後才陸續浮現出來。換句話說，除了具備一個官員的身份之外，當時的文人都沒有

⁶⁵ 薛瑞生、孫虹〈清真事蹟新證〉認為周邦彥「亦未提舉大晟府」（《新宋學》，頁93；《清真集校注》，頁74）。諸葛憶兵（1959–）〈周邦彥提舉大晟府考〉（《文學遺產》1997年第5期）云：「周邦彥提舉大晟府，在政和六年十月至政和七年三月之間，任期最長不超過半年，短則或許只有一二個月。這與《東都事略》、《宋史》『未幾』之說吻合。」（頁116）又村越貴代美〈周邦彥和大晟樂〉（載《首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則云：「周邦彥任大晟府提舉期間，應在劉曷後蔡攸前、政和七年到政和八年很短一段時間。」（頁586）爭論尚多，意見不一。

⁶⁶ 孫虹、薛瑞生：《清真集校注·前言》云：「哲宗於元祐八年九月親政，邦彥不見遽升亦不見內調；徽宗崇寧元年以新舊劃正邪，正黨名單不見邦彥之名，均可證此說。由此可知，邦彥一生仕途的升遷浮沈，與新舊黨爭無涉。」又云：「所以邦彥仕途顯達的原因，決非如王國維氏所謂『循資而遷』，而是官運一繫之於新黨蔡京集團人物特別是蔡京當國與否。」（頁11–12）

⁶⁷ 《周邦彥清真集箋》，「集評」，頁285。

⁶⁸ 宋莊綽《雞肋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云：「周邦彥待制嘗為劉曷之祖作埋銘，以白金數十斤為潤筆，不受。劉無以報之，因除戶部尚書，薦以自代。後劉緣坐王家詆言事得罪，美成亦落職，罷知順昌府宮祠。周笑謂人曰：『世有門生累舉主者多矣，獨邦彥乃為舉主所累，亦異事也。』」（頁70）案莊綽自序署紹興三年（1133），其後尚有所補充。

談到周邦彥，他在文壇上可能是沒有甚麼名氣的。此外，周邦彥在詩、文、詞中一般都很少交代明確的時地背景，也很少提到當時的人物，例如詩中只有蔡肇、李公麟、賀公叔、游酢(1053-1123)、周沔等人；詞中則有〈水調歌頭〉「中秋寄李伯紀大觀文」、〈鬢雲鬆令〉「送傅國華奉使三韓」各一闕，前者或為何大圭詞，靖康元年(1126)以後作；後者寫的是宣和四年(1122)的事件，均在周邦彥卒後，顯為偽詞。⁶⁹大抵周邦彥在生前就跟很多默默無名的文人一樣，只是用心構建作品中精美自足的藝術境界，不善於交往酬酢，頗有違世的意味。

周邦彥詞盛傳於世，可能是在南渡之後。孝宗淳熙七年(1180)，強煥任溧水令，其〈題周美成詞〉云：「余慕周公之才名，有年於茲，不謂八十餘載之後，踵公舊蹤，既喜且媿。故自到任以來，訪其政事，於所治後圃得其遺政，有亭曰姑射，有堂曰蕭閒，皆取神仙中事，揭而名之，可以想像其襟抱之不凡。而又睹新綠之池，隔浦之蓮，依然在目。抑又思公之詞，其摹寫物態，曲盡其妙，方思有以發揚其聲之不可忘者而未能。及乎暇日從容式燕嘉賓，歌者在上，果以公之詞為首唱，夫然後知邑人愛其詞，乃所以不忘其政也。余欲廣邑人愛之之意，故哀公之詞，旁搜遠紹，僅得百八十有二章，釐為上下卷。」序中提到很多周邦彥詞中的典實，使作品得與官署後圃的景觀相互印證。其後樓鑰〈清真先生文集序〉云：「公之歿，距今八十餘載，世之能誦公賦者蓋寡，而樂府之詞盛行于世，莫知公為何等人也。公嘗守四明，而諸孫又寓居於此，嘗訪其家集而讀之，參以他本間見手稿，又得京本文選，與公之曾孫鑄哀為二十四卷。中更兵火，散墜已多，然足以不朽矣！」此序敘述周邦彥文集編成，約在寧宗嘉泰年間(1201-1204)。晁公武(?-1171?)《郡齋讀書志》、陳振孫(1211-1249)《直齋書錄解題》亦見著錄。其後《片玉集》十卷，陳元龍集注，今存嘉定四年(1211)劉肅〈片玉集序〉，並由朱孝臧(1857-1931)編入《彊村叢書》中，流傳最廣。

至於周邦彥詞在北宋的流傳情況，小說家言繪影繪聲，例如〈少年遊〉、〈蘭陵王〉諸詞，與宋徽宗及李師師扯上三角戀愛的關係，王國維已經一一辨析清楚了，不足憑信。其實除了南宋的筆記詞話之外，北宋人並沒有片言隻字提及周邦彥詞曾在汴京廣為流播，例如《高麗史·樂志》所載北宋詞曲，雜曲四十首，並不注明作者，其中十五首作者可考者，柳永(987?-1053)佔八首，其他晏殊(991-1055)、歐陽修、蘇軾、晁端禮(1046-1113)、李甲、趙企(?-1118)〔或王觀〕、阮逸女各一首。⁷⁰晁補之評本朝樂章，僅論張先、柳永、晏殊、歐陽修、蘇軾、黃庭堅(1045-

⁶⁹ 參王國維：〈清真先生遺事〉，頁一九、二〇；羅忼烈：《周邦彥清真集箋》，頁266-68。

⁷⁰ 吳熊和：《吳熊和詞學論集》(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附錄：《高麗史·樂志》所載北宋詞曲，頁54-76；又參朝鮮鄭麟趾(1396-1478)等：《高麗史》，雲南大學〔下轉頁222〕

1105)、秦觀七人。李清照〈詞論〉則評柳永、張先、宋祁(998–1061)、宋庠(996–1066)、沈唐、元絳(1009–1084)、晁端禮、晏殊、歐陽修、蘇軾、晏幾道(1038–1110)、賀鑄(1052–1125)、秦觀、黃庭堅十四人。⁷¹這幾份名單都沒有周邦彥。蘇門中人名聞四海，可以不論；其他如晁端禮於政和三年(1113)除大晟府協律郎，賀鑄等均與周邦彥同時，就算「詞語塵下」、「破碎何足名家」，按理李清照都應該有所評述；而這也間接顯露出周邦彥在汴京的知名度並不太高，可能要到南宋時才廣為流行，傳唱不輟。

近來也有學者認為李清照不提周邦彥是表示他們持有相同的論詞觀點。例如鄧魁英雜引沈義父《樂府指迷》、張炎(1248–1320?)《詞源》、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以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論點，認為「這些評論的出發點和李清照〈詞論〉中所要求的協樂、高雅、典重、鋪敘、故實，……極相一致。周邦彥正是主張『當行本色』的詞家中間的典範人物，所以才避免了李清照的批評」。⁷²劉揚忠認為周邦彥是北宋詞壇的巨擘，「李清照是比清真晚生29年的後輩詞人，她對詞立論特高，其〈詞論〉歷摘北宋諸家之疵，唯獨於清真未置一貶語，可見清真在主張『詞別是一家』的傳統詞派陣營裏是如何受到崇敬了」。⁷³一廂情願的指李清照力捧周邦彥，苦無證據，推論亦不合邏輯，只能說是某些學者的主觀願望，不切實際。

上文用了很多篇幅檢視周邦彥在北宋文壇的地位。大抵周邦彥僅憑〈汴都賦〉知名，得享三朝之眷。此外，周邦彥詞名不彰，北宋詞壇看來並沒有提過周邦彥，他的詞要到南宋以後才逐漸傳唱出去，傳說亦多，名動全國，也是很奇怪的現象。至於周邦彥的詩名，蘇門中人陳師道、晁補之、張耒對他都評價頗高，但資料不見得完整可靠，周邦彥詩在宋詩中幾乎沒有甚麼地位，僅在研究周邦彥生平的時候順帶用作參考材料。劉揚忠說：「周邦彥雖然工詩，但他的詩與詞相比，畢竟是繼承多而創造少，因而成就是次要的，與他的詞在文學史上的較高地位不能相比。」⁷⁴現在，我們要重新檢視周邦彥詩的藝術成就，兼論周邦彥在北宋詩壇的地位。

〔上接頁221〕

圖書館藏明景泰二年(1451)朝鮮活字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影印，1996年)，卷一六〇〈樂志二〉，頁691–711。

⁷¹ 晁補之「評本朝樂章」、李清照(1084–1156)〈詞論〉均見胡仔(1110–1170)：《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卷三三，頁253–54。

⁷² 鄧魁英：〈關於李清照「詞論」的評價問題〉，載濟南市社會科學研究所(編)：《李清照研究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293。

⁷³ 《周邦彥傳論》，頁46。

⁷⁴ 劉揚忠：〈周邦彥佚文佚詩淺議〉，載《文學評論叢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十八輯(1983年10月)，頁183。

論周邦彥詩體融唐宋

宋詩以楊億(974–1020)、梅堯臣(1002–1060)、蘇舜欽(1008–1048)三家為起點，楊億筆力宏壯，諷刺時弊；梅堯臣清切古淡，蘇舜欽豪邁激越，皆能寫出生活品味，反映時代精神。歐陽修專學李白、韓愈(768–824)，同時也吸納了宋初前輩詩人的長處，雍容閒雅，流暢平和，風神氣象，搖曳多姿，宋詩的規模已具，疊起波瀾。出歐門者有荊公、東坡二體，而取徑有險窄與寬泛之異，各造境界。王安石以意氣自雄，鋒芒筆露，晚年繁華落盡，婉約渾成。王安石詩講究創意，不同流俗，表現出獨有的學力、識見、技巧、法度，語工意新，精嚴華妙。當時能與王安石詩風相頡頏者不多，例如王令(1032–1056)頗學其古體，而曾鞏(1019–1083)的七絕「更有王安石的風致」，⁷⁵其實各有所偏，未能照應全局。蘇軾天才橫溢，豪健曠遠，行雲流水，度越常軌，隨遇而安，神變莫測。加以有容乃大，議論鋒發，故蘇門人才濟濟，名重天下，各具面目，不相蹈襲。其中尤以黃庭堅拗峭奇特的詩風更負盛名。

元祐以後，蘇、黃二家逞才使氣，爭奇鬥巧，詩書煥發，風靡天下。蕭慶偉云：「蘇、黃以其不同而得以並稱，就在於二人詩風詩法的融合恰好體現了宋人論詩的主張，換言之，蘇軾的『意』和黃庭堅的『法度』，是當日或此後詩人都想得到的東西。」⁷⁶蘇、黃多題畫詩、唱和詩，競押險韻，炫耀博學，切蹉詩藝，稍嫌俗濫，雖不乏名篇佳作，惟風神興象，漸次乖離，其實也是得失互見的。嚴羽云：「近代諸公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以是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歉焉。」⁷⁷大抵「歉」者只是針對蘇、黃的末流說的，蘇、黃二家各備一體，⁷⁸姿采紛呈，從而揭出了宋詩獨有的精神氣象，面目一新，形成了一個以文為詩、雅俗共賞的新局面。不過，就在這股強勁的蘇、黃詩風籠罩之下，周邦彥卻不同流俗，悄悄地回歸到王安石典麗雅緻的詩風道路上面，融和唐宋，自抒懷抱。

周邦彥詩僅存四十五首，數量不多，但質量卻高，題材廣泛，思想深刻，風格多姿，寫出新意，例如在上文所引的十二首詩，尤多精品，或足以在宋詩中佔一席位。周邦彥詩以七古為最高，氣勢磅礴，寓意深刻，現存八首。其中〈天賜白〉、

⁷⁵ 錢鍾書(1910–1998)(選注)：《宋詩選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頁47。

⁷⁶ 蕭慶偉：《北宋新舊黨爭與文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頁242。

⁷⁷ 嚴羽(1197?–1241)(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詩辨〉，頁24。

⁷⁸ 嚴羽又指出「以人而論」者，宋詩有東坡體、山谷體、後山體、王荊公體、邵康節體、陳簡齋體、楊誠齋體，凡七體，而總以蘇、黃為首。參《滄浪詩話校釋·詩體》，頁54。

〈薛侯馬〉二首，專詠宋、夏永樂城之戰，刻劃戰況的慘烈，注入史實的細節，議論得體，具有史詩的氣派，感天動地，壯懷激烈，抒發愛國情懷，呼籲珍惜人才，北宋詩中很少見到這類題材。〈開元夜遊圖〉、〈越臺曲〉二首則是藉詠史起興，前者由觀畫影射徽宗朝的浮靡世風，批判現實，以亡國為戒，指出危機所在；後者則由一則古老的傳說渲染濃郁的鄉情，探索宇宙人生的永恆母題。周邦彥這四首七古都是四句一換韻的歌行體，就像高適(700-765)的〈燕歌行〉一樣，在節奏上模仿盛唐音調，但又表現一種睿智和冷靜，以理服人，兼融唐宋，寫出新意，即在宋詩中亦具有超前的地位。劉揚忠認為：「這些七古都顯得豪放俊爽，文筆遒健，見出作者學習盛唐詩所下的深功夫。」⁷⁹其實只說對了一半，而忽略周邦彥詩中深沈的理趣特色。

在五古方面，〈過羊角哀左伯桃墓〉、〈楚平王廟〉二首利用野史傳聞，刻劃現實人性。前者歌誦朋友間的交誼，死生相許，十分壯烈；後者摹寫君臣間的衝突，相互報復，尤為慘烈；這些都有助於喚起對北宋黨禍深刻的反省和思考。其他〈遠遊〉、〈夙興〉、〈楚村道中〉(其二)等寫思想的漫遊，擺脫世俗的束縛，風光迷幻，秘怪紛呈，尋仙訪道，深具警世意味。周邦彥這些五古揭示幽隱的內心意識，尤為詭異，深勁透關，表現瘦硬堅剛的氣質，也是宋詩中的傑作。

宋詩耽於禪悅，講求理趣，但周邦彥詩卻深染道風，這在宋人詩中也是別開生面，獨具一格的。例如〈仙杏山〉、〈芝朮歌〉、〈宿靈仙觀〉、〈贈常熟賀公叔隱士〉、〈懷隱堂〉、〈下帷齋〉、〈晚憩杜橋館〉、〈游定夫見過，晡飯既去，燭下目昏，不能閱書，感而賦之〉八首，前四首為七古，後四首為五古。七言體悟道心，發人深省，例如「仙人藥光明夜燭，種杏碧山如種玉」、「日精潛燭山自明，人力窮搜神不與」、「戲上雲崖撼瓊樹，脫葉出溪驚世人」，比喻鮮活跳脫，光采照人，契合自然，意境清新，每有石破天驚之感，震撼心弦。羅忼烈認為周邦彥任溧水令後思想一變，「自廬州而荊州，至元祐八年春，始得溧水令，在任三載，偃蹇薄宦，已屆中年，少年銳氣，消鑠殆盡。復以溧水地邇茅山，玄風特盛，靈異頗多，佗際之餘，不能無所寄託以自理遣，固亦人情之常也」。⁸⁰劉揚忠亦云：「王安石〈登大茅山頂〉詩中就有：『陳跡是非今草莽，紛紛流俗尚師仙』之歎。周邦彥當時已四十來歲，長期漂泊輾轉於州縣，少年銳氣已銷磨殆盡，唯胸中塊壘尚難以自消，所以他頹然自放，不免托道家的思想以求解脫。……他這一時期游歷鄰近溧水的茅山等地時所寫的詩歌如〈芝朮歌〉、〈宿靈仙觀〉等，也都流露了對求仙學道超脫紅塵

⁷⁹ 劉揚忠：〈周邦彥佚文佚詩淺議〉，頁182。

⁸⁰ 羅忼烈：〈周邦彥何以自號清真〉，載羅忼烈：《文史閒談》(香港：現代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133。

的濃烈興趣。」⁸¹ 周邦彥的仙道詩講求治道，由治身而治國，而非逃避現實，亦為佳製。五古〈下帷齋〉「書生本不武，誰語負薪憂」、「至勝不刃血，吾將執其柔」，宣揚武德捍敵，說出至理。〈懷隱堂〉中的「侯」可能也是一位不得志的奇才，詩中有「深輦畏軒冕，自謂山林寬」、「我侯坐少孤，久著聚鷗冠」、「侯今未全老，每據伏波鞍」、「因侯有華構，彌起百憂端」等，歸隱山林，但又未能完全忘懷世情，關心治道，在宋詩中另闢新境。

周邦彥五絕只有〈曝日〉及〈竹城〉二首，均為古絕。〈曝日〉云：「冬曦如村釀，奇溫止須臾。行行正須此，戀戀忽已無。」寫冬日的暖和，可惜過於短暫。語言淺易，風格平淡。錢鴻瑛云：「清真的美學思想受哲學思想影響有崇尚自然的一面，如其佚詩〈曝日〉，……很有陶詩作風。」⁸² 至於七絕七首，前引〈鳳凰臺〉、〈春雨〉，精嚴華美，意境空靈。其他〈謾成〉（二首之二）云：「河聲連底卷黃沙。回首方驚去國賒。唯有客情無盡處，暗隨春水漲桃花。」〈謾書〉（三首之三）云：「窗風獵獵幔影斜。酒餘春思托韶華。高樓不隔東南望，苦霧游雲莫謾遮。」客途悵望，情景交融，典雅精緻，意蘊深長，「漲」字「隔」字，精悍曼妙，神韻悠揚，似乎都能汲取荊公體深婉不迫、精嚴深刻的長處，味之無盡，愈覺醇厚。

至於五律僅存〈謾書〉二首，其一結云：「情來愁不語，極目雁南征。」其二結云：「雙眉誰與畫，張敞自風流。」洋溢華美與豔情，近於詞境。七律九首，則多應酬之作。周邦彥的律詩未算出色。

周邦彥亦多唱和詩，有時會用相同的韻字連寫四五首，炫耀學問，具有逞才爭勝的意味，亦嫌俗濫。〈天啟惠酥〉七律四首，全押平聲虞韻「酥」、「廚」、「迂」、「翻」四字，但首句則分別用「車」、「雛」、「無」、「書」四字，其中「車」、「書」二字屬魚韻，整齊中有所變化。詩中分別摹寫各地的好酥、北酥、雍酥、玉酥，但結句都歸於說理，例如「欲比君家好兄弟，不知誰可作醍醐」、「饜肉便知全鼎味，它時不用識醍醐」、「聞道加餐最肥澤，異時煩與致醍醐」、「猶恐愴人笑風土，預從貝葉檢醍醐」，豐富心靈的味覺，通於詩歌境界，而且彰顯學問，多用典故，發揮議論，而略帶生澀和枯淡之感，可以給讀者提供廣闊的思考空間。又〈次韻周朝宗六月十日泛湖〉五首，五言八句，全押去聲翰韻「段」、「散」、「幔」、「半」四字，當屬古體。其中「疏林直炊煙，落日斜酒幔」、「湖洄晚漁集，山靜村樵散」、「何當飲清光，乘月行夜半」、「儒生長窘束，書燈守幽幔」諸聯，鍊字精警，格高韻響，亦不乏佳製。可見周邦彥面對同輩的友人如蔡肇、周沔等時，很自然就會疊韻為詩，

⁸¹ 《周邦彥傳論》，頁27。

⁸² 《周邦彥研究》，頁42。

愈寫愈奇，這跟蘇門酬唱和韻的模式一樣，表現文采競勝的雄心，自然也反映北宋一代的詩風了。

周邦彥詩體融唐宋，一方面傳承唐詩的韻律和風神，掩映多姿；一方面又顯出宋詩的新警和深刻，體貌多變。曾棗莊認為：「其詩受韓愈、李賀影響較大，在江西詩派詩風盛行之際，可謂獨闢蹊徑。」⁸³大概是指周邦彥詩中充滿詭異的情調和苦澀的感覺，例如〈過羊角哀左伯桃墓〉、〈鳳凰臺〉等，刻劃變形，渲染異色，荒誕不經，空寂陰冷。其實周邦彥詩尤近於荊公體，表現匡俗濟世的壯懷，亦見精絕雅麗的小詩。王安石信佛，擺脫虛妄；周邦彥悟道，振起玄風。其實殊途同歸，都是追求心靈中的一枝之安，各有所托。書生本色，而歸結必以儒行為本，重視事功。周邦彥詩以寫實為主，議論風發，復以思理嚴密、感情顯豁、意象精美，音韻悠揚，皆能彰顯宋詩的本色，表現個人的獨有品味。

周邦彥原有用世之志，但朝局動蕩，黨同伐異，遷調頻繁，苦於行役，為此明哲保身，兩無依傍。中年以後深染道風，道德文章，安身立命，而這更是知識份子的必然歸宿。例如王安石隱於佛，蘇軾遊於道，黃庭堅守於儒，皆使生命有所依傍而已。周邦彥詩久為詞名所掩，大家對周邦彥詩認識不多，至為可惜！不過，從作品的表現來說，周邦彥仰慕王安石的人格、事功和文學。例如元豐六年上〈汴都賦〉，歌頌新政，雖說有政治表態的意味，其實也是對王安石新政的肯定，至死不渝。王國維云：「〈重進汴都賦表〉高華古質，語重味深，極似荊公制誥表啟之文，末段倣退之〈潮州謝上表〉，在宋四六中頗為罕觀。」⁸⁴此外，周邦彥詩中的〈越臺曲〉似有意仿效王安石的〈明妃曲〉，渲染鄉土濃情，立意新穎；〈開元夜遊圖〉則仿〈開元行〉，立意及取材相似，後出轉精；而〈無題〉寫山川景色，結謂「無人橫催租，烹鮮會同井」，寄託政治理想，自然也是王安石〈元豐行示德逢〉、〈後元豐行〉的續作。七絕如〈春雨〉、〈偶成〉、〈二月十四日至越州，置酒泛湖，欲往諸剎，風作不能前〉等，鍊字鍊意，吐屬不凡，亦與荊公體的風格相近。莫礪鋒認為荊公體的「主要風格特徵是既新奇工巧又含蓄深婉，其主要載體是他晚期的絕句」，周邦彥彷彿得之。⁸⁵詞中〈西河〉則仿王安石的〈桂枝香〉，同寫「金陵懷古」，善於融化唐人詩句，各具風神。凡此皆可以看出周邦彥仿效王安石的痕跡，詩文詞賦，成就卓著，似又非僅學詩一途而已。

⁸³ 曾棗莊(1937-) (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宋代卷》(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570。

⁸⁴ 王國維：〈清真先生遺事〉，頁二二。

⁸⁵ 莫礪鋒(1949-)：〈論王荊公體〉，載莫礪鋒：《唐詩詩論稿》(瀋陽：遼海出版社，2001年)，頁284。

自南宋以後，周邦彥詞享譽日隆，清代以後更逐漸被詞論家推上巔峰。例如沈鬱頓挫、比興寄託、離合片段、色澤音節、善於融化唐人詩句等，都是清真詞的佳處所在。周濟云：「清真，集大成者也。……問塗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余所望於世之為詞人者，蓋如此。」「清真渾厚，正於鉤勒處見。他人一鉤勒便刻削，清真愈鉤勒，愈渾厚」。⁸⁶ 陳廷焯云：「然其妙處，亦不外沈鬱頓挫。頓挫則有姿態，沈鬱則極深厚。」「美成詞，有前後若不相蒙者，正是頓挫之妙」。⁸⁷ 這些觀點都與黃庭堅論詩講求規矩法度、句律精深、變態百出以至婉約渾成的主張相合，黃庭堅云：「但始學詩，要須每作一篇，輒須立一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焉，乃為成章耳。」⁸⁸「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為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⁸⁹「但熟觀杜子美到夔州後古律詩，便得句法。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如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無斧鑿痕，乃為佳作耳」。⁹⁰ 以至點鐵成金、奪胎換骨之說，都是學詩法度的精義所在，而與周邦彥詞的藝術表現若合符節。黃庭堅官卑位微，迭遭貶謫，忠義之氣漸趨消解，而內斂自守的精神則昇華為平淡渾成的境界。這些都跟周邦彥恬退畏禍的本性暗合。

詩詞體製不同，審美的方式亦異，但蘇軾以詩為詞，質性相通，此後詩詞在表現手法上自然也有相互借鏡的地方。周邦彥詩基本上不受黃庭堅的影響，以流暢平順為主，稍欠拗折的姿態；但詞的表現則適與江西詩派的一些論詩主張相合，或是說，黃庭堅的詩論恰好就在周邦彥詞中呈現出來，沈鬱頓挫，鉤勒渾厚，句律結構，精嚴華美。大抵這也是時代風氣所致，他們可沒有直接的師承關係。要之，他們有一個共同來源，就是同以杜甫為師，黃庭堅學杜深入句律音節之中，專講活法，變態百出。而周邦彥學杜的功力亦深，王國維認為「精工博大」、「詞中老杜」；羅忼烈也指出清真詞「中年後作風變為沈鬱頓挫，感慨無端，格調老蒼，句

⁸⁶ 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載《介存齋論詞論著》，頁12。

⁸⁷ 陳廷焯（1853-1892）（著）、杜維沫（校點）：《白雨齋詞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頁16-17。

⁸⁸ 黃庭堅：〈論作詩文〉，載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684。又見王直方（1069-1109）《王直方詩話》「山谷論詩」條云：「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成章耳！」參《宋詩話全篇》，頁1143。則黃庭堅原文亦當為「三致意焉」，今缺「意」字。

⁸⁹ 黃庭堅：〈題意可詩後〉，載《黃庭堅全集》，頁665。

⁹⁰ 黃庭堅：〈與王觀復書第二首〉，載同上注，頁471。

法奇倔」之作，⁹¹皆可為證。此外，王安石也是學杜有得的重要詩人，緒密而思深，那麼，周邦彥與王安石之間，自然是更多了一層精神上的契合和感召了。⁹²

⁹¹ 羅忼烈：〈清真詞與少陵詩〉，載《詞學雜俎》，頁75。

⁹² 《遜齋閑覽》引王安石論云：「蓋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闡奧，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以謂兼人所獨專，斯言信矣！」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六，頁37。

A Study of Zhou Bangyan's Poetry

(A Summary)

Wong Kuan Io

Zhou Bangyan is best known for his lyric (*ci*) composition but there had been few comments on his *shi* poetry because they were thought to have been lost. However, forty-five of his poems have been retrieved through the sustained efforts of Li E, Ting Lizhong, Luo Kanglie, and Tan Guizhang. The present essay comprises three main parts. First, it will discuss the poetic accomplishment of Zhou Bangyan, whose works contain the depiction of reality, reviews of history, descriptions of scenery and utterances of ambition. They reflected the melancholy and sorrow of intellectuals with deep political implications, which are very different in style from the *ci* lyric. Second, it will investigate his standing in the literary arena of the Northern Song: he was best known for his classical prose, but not famous in *ci*, and was less known for his work of poetry. Lastly, it will discuss his accomplishment in poetry: his poems possess a synthesized style of the Tang and Song, and excel in emulating Wang Anshi's "Jinggong ti" in sentence structure. Zhou Bangyan's work of poetry is calm and contemplative, attentive to poetic methods and rules; he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poet of great creativity and novelty in the late Northern Song and deserve a seat in the poetic arena of that time.